

关于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性质的 几点思考*

朱永刚 吉 平

关键词: 南宝力皋吐墓地 文化性质 文化成份 多元组合

KEYWORDS: Nan Baoligaotu Cemetery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Elements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ABSTRACT: The Nan Baoligaotu Cemetery contains not only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Xiaohewan Culture, Pianbaozi Culture and other nearby cultures but also that of the northern cultures whose natures have not been confirmed, as well as the pottery assemblages with clear local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it is neither a local conversion of Xiaohewan Culture nor the western diffusion of Pianbaozi Culture but an integration of the elements of the multiple cultures. The most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Nan Baoligaotu Cemetery is the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its unique cultural nature is different from all known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and represents a new-found Neolithic culture which could be temporarily named "Nan Baoligaotu Type."

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墓地从 2006~2008 年连续发掘 3 年, 揭露面积总计达 1 万多平方米, 共清理墓葬 395 座, 如果算上被盗掘的 100 多座墓葬, 实有墓葬数量不少于 500 座。这么大规模的墓地在内蒙古东部乃至东北地区实属罕见。该墓地随葬品丰富, 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角器、蚌器等各类遗物 1500 余件。而更为重要的是, 从文化面貌来看, 其中既有与小河沿文化相似的器形, 又有偏堡子类型的陶器, 还有自身特点鲜明的陶器群。就随葬品文化成份的多元性而言, 这是一种尚未认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由于南宝力皋吐墓地所处的科尔

沁沙地北部地区, 以往田野工作比较薄弱, 尤其对史前考古学文化的了解几乎是空白, 所以南宝力皋吐墓地的发现及相关报道, 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普遍关注。

南宝力皋吐墓地相关报道指出“在这里首次发现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中部新石器时代晚期两支重要遗存——小河沿文化和偏堡子类型共存的实例, 为研究两种文化的关系提供了至为关键的材料。此外, 自身特色的陶器群有可能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1]。那么这种文化是小河沿文化, 还是偏堡子类型, 或是强调那些尚未被认识陶器的差异性而另立新的考古学文化? 对于这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 2007JJD780122)。

作者: 朱永刚, 长春市, 130012,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平, 呼和浩特市, 01001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样一种似相识又陌生、且所含多种文化成份的标识性很强的遗存，如何界定其文化性质，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关于南宝力皋吐墓地的文化性质问题，首先要考虑年代，因为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南宝力皋吐墓地揭露面积大，已发掘的A、B、C三个地点的墓葬形制、头向、葬式、排列和随葬品方面没有明显区别，几乎没有打破关系。陶器的质地、火候、颜色和制法基本相同，应属于同一时期遗存。通过对陶器的比较分析，其中一部分陶器，如饰交叉细绳纹的筒形罐、侈口高领壶、双口壶、折腹盆、钵，是小河沿文化大南沟墓地普遍见到的器物；另一部分陶器，如叠唇罐、矮领深腹壶和条形附加堆纹、复线回形纹、三角形纹等，与偏堡子类型的器形和纹饰极为相似。

小河沿文化的绝对年代，仅发表过大南沟墓地的三个数据，其中M76树皮样本的常规测年为距今 4345 ± 80 年，按达曼表树轮校正为 4830 ± 180 年，经高精度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2915~2667年；M54、M35均使用人骨样本，常规测年分别是距今 3785 ± 100 年、 3640 ± 120 年，达曼表树轮校正为 4135 ± 120 年、 3955 ± 135 年，经高精度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200~1940年和公元前2040~1740年^[2]。由于后两个数据明显偏晚，在使用时往往被排除。但需要指出的是，人骨与木炭的同位素在热运动中的表现不同，致使碳十四的分子含量也有所不同，必须经同位素分提效应的年代校正后方可进行比较。有学者在分析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近百例人骨样本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后，得出的校正值约为200年^[3]。如果采取这种方法对后两个数据进行校正，就缩小了与M76树皮样本测年误差的幅度。在石棚山墓地的分期中，M76属早期，另两个数据可作为晚期参考，这样小河沿文化的年代

跨度大约在距今4000~5000年之间。

目前，偏堡子类型没有做过碳十四年代测定。不过根据大连地区小珠山遗址最新发掘的报道，层位关系上晚于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偏堡子类型遗存被小珠山上层文化所叠压^[4]。小珠山中层文化碳十四测定数据共发表了10个，综合这些数据，其较晚年代为公元前2800~2500年；小珠山上层文化碳十四测定数据共有4个，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2000年^[5]。结合文化面貌与偏堡子类型相似，并含有明显山东龙山文化特点的辽宁岫岩北沟遗址陶器分析，偏堡子类型年代应处于小河沿文化晚期^[6]。

2010年，在内蒙古扎鲁特旗召开的“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墓学术研讨会”上，披露了一组南宝力皋吐墓地碳十四年代数据^[7]。这组数据经高精度树轮校正，除个别数据年代偏晚外，跨度基本在公元前2500~2000年。

将以上几组数据比对，南宝力皋吐墓地的年代与小河沿文化晚期或偏堡子类型年代大体相当。如此，在相对年代方面，可以进一步认定南宝力皋吐墓地包含的那些互为对应的多种文化成份的“共时”关系，按目前对内蒙古东部和辽宁史前考古学文化的认识，这是一处大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地。

小河沿文化大体是继红山文化之后在辽西地区形成发展起来的，以筒形罐、高领壶、彩陶钵、高柄豆、折腹盆和磨制石器、骨耒石刃刀等为组合，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这一时期陶器以素面为主，纹饰种类增加，此前一直流行的压印之字纹消失，被拍印的细绳纹所取代。另外，彩陶纹饰的简化，彩绘黑陶的出现，以及随葬陶器的明器化和竖穴半洞室等丧葬习俗的改变，凡此种现象都表明小河沿文化正进入一个社会更替、文化发生明显变迁的新阶段。

小河沿文化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一些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和墓地多集中在赤峰地区,由此向东,通辽地区科尔沁沙地以北,则渐为稀少。

毋庸置疑,南宝力皋吐墓地中含有小河沿文化因素,但其占有多大分量,是一般文化交流而出现的个别现象,还是可以直接决定墓地文化性质的主体成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分析。

首先,墓葬形制和葬俗。南宝力皋吐墓地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A、B、C 三个地点墓葬头向在 110~160 度之间,方向比较一致。葬式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未见屈肢葬。发现少量双人或多人墓,皆男女合葬,头向相同。以小河沿文化已经过大规模发掘的大南沟石棚山墓地为例, A、B、C 三区头向不一致^[8]。墓葬形制除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外,还有 16 座为竖穴半洞室墓,占全部发掘墓葬的 21%。葬式均为仰身屈肢,且下肢屈度甚大,一种为“跪姿”,另一种为“坐姿”,显然这两种姿势都是下葬前对死者有意安排的。石棚山墓地发现 3 座双人合葬墓,但男女主人处于同一线上,两腿相交或相叠压,头向相反。应该说两者的墓葬形制和葬俗并不相同。

其次,陶器。一般认为陶器具有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属性,而对基本器物组合的把握又是分析文化内涵与外延、辨识文化性质不可或缺的手段。南宝力皋吐墓地常见器形有筒形罐、叠唇罐、鼓腹罐、壶、折腹盆。器表除素面外,纹饰可分两种,一种是条形附加堆纹,包括一部分仿绳索纹,另一种是复线几何纹。前者多饰于筒形罐和叠唇罐口、腹部,后者多饰于壶和鼓腹罐腹部。此外,还见有少量的交叉细绳纹、刻划纹、黑红彩等。从随葬品的共存关系来看,最常见的陶器组合是筒形罐和壶或叠唇罐,个别组合出现了钵或折腹盆^[9]。石棚山墓地有 62 座墓葬随葬陶器,共 201 件。其中,48 座墓葬随葬

筒形罐 58 件,占随葬陶器总数的 29% (下同); 32 座墓葬随葬豆(包括彩陶豆) 41 件,占 20%; 30 座墓葬随葬钵 36 件,占 18%; 15 座墓葬随葬折腹盆 19 件,占 10%; 10 座墓葬随葬壶 15 件,占 7%。如果按 10% 以上的出现率,石棚山墓地陶器基本组合为筒形罐、豆、钵和折腹盆,个别组合出现壶及其他器形。从器表纹饰来看,夹砂筒形罐口部多见附加堆纹,腹部往往饰细绳纹或刻划纹,泥质红陶钵和豆上部多施黑彩。由此可以证明,南宝力皋吐墓地和小河沿文化在陶器的基本组合和纹饰风格上有明显区别。

第三,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应该说两者在石、骨类生产工具方面有一些器类相同,形制也很相似,如磨制石斧、石锛、细石器、骨梗石刃刀(匕)。不同的是,南宝力皋吐墓地出土有磨盘、磨棒、饼形石器,还有打制石器和十分罕见的石骨朵(权杖头)。相比较,南宝力皋吐墓地的细石器制品更为丰富,如三角形凹底石镞、各种形式的刮削器、石钻、石刃等,所见细石器制品均为二次加工。骨梗石刃刀(匕)出土数量多,制作精致。在装饰品方面,南宝力皋吐墓地多随葬玉器,以坠、环、璧、璜等小型饰件为主,并有绿松石制品。检视石棚山墓地,共有 47 座墓葬随葬有装饰品,其中 32 座墓葬随葬石璧或石环。从发表的资料来看,石璧多发现于男性墓,置于颈部或胸前;石环多出于女性墓,佩戴于手臂。显然石棚山墓地装饰品所反映的性别倾向与南宝力皋吐墓地有很大不同。

概之,南宝力皋吐墓地与小河沿文化在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和随葬品方面的区别是主要的,陶器的形制、组合和纹饰特征也存在明显差异,所以不宜将南宝力皋吐这类遗存归入小河沿文化。

三

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成份的复杂性,不在于因文化交流而出现其他文化的个别因

素,而在于不同文化来源的文化因素在同一墓地甚至同一墓葬(随葬品)都占有相当分量。除小河沿文化外,还有一类文化特征鲜明的陶器也占有较大分量。如器表饰竖向或曲齿状条形附加堆纹的叠唇罐,刻划三角形、折线形复线几何纹矮领深腹壶等,无论器形和还是纹饰风格,都凸显偏堡子类型的特征。

1956年,王增新报道了辽宁新民县东偏堡沙岗子遗址采集的几件陶器,其中1件筒形罐器表饰有竖向的条形附加堆纹,同时在该遗址还发现一些刻划纹和细泥条堆纹陶片。报道者认为“陶器的式样和花纹都很少见”,“显然是易于区别而有特殊性的”^[10]。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队在沈阳肇工街发掘到这类陶器的原生堆积,在丰富其文化内涵的同时也证明这类遗存是单独存在的^[11]。20世纪70年代后,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新民县东高台山和沈阳市新乐遗址的发掘中,找到了确认相对年代的层位关系^[12]。学界普遍认为这类遗存是继新乐下层文化之后,分布在下辽河流域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称“偏堡子类型”或“偏堡子文化”^[13](本文称偏堡子类型)。

关于偏堡子类型的来源,有一种观点认为其可能源于辽东半岛南端的“三堂一期遗存”,而这类遗存最富特征的叠唇罐上所饰条形附加堆纹,甚至可以追溯到山东的北辛文化^[14]。在渤海沿岸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序列中,以饰条形附加堆纹为特征陶器的“三堂一期文化”在层位关系上早于小珠山上层文化,即早于偏堡子类型^[15]。所以从陶器形制和纹饰特征分析,以叠唇罐和条形附加堆纹为特色的偏堡子类型,是“三堂一期遗存”向北传播并吸收当地文化因素的结果。

南宝力皋吐墓地偏堡子类型陶器占有相当分量的现象,改变了以往人们对偏堡子

类型的认识,扩大了其涵盖的研究范围,但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以怎样的途径传播的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学者对20年前在科尔沁沙地东南部奈曼旗大沁他拉周围沙丘采集的一批陶器进行分类研究,将该遗址采集的1件腹部饰纵向直条夹波浪条形附加堆纹罐,从原定的红山文化中析出,指出这种易于区别的特殊纹饰也不同于小河沿文化,应被看成是偏堡子类型向西的流布,并推测“沿科尔沁沙地南缘,经奈曼、库伦、彰武、康平一线,是沟通辽西腹地与辽河平原的重要通道”^[16]。由于南宝力皋吐墓地发现了偏堡子类型陶器,使这种联系变得明晰起来,证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确实存在这样一条传播路线。

南宝力皋吐墓地还含有其他文化成份。如主要饰于陶器口部的多重横向条形附加堆纹、复线几何纹、八字形戳印纹等,与嫩江下游小拉哈一期遗存和昂昂溪文化陶器十分相似^[17]。另外,在报道中被称为“釜”的那种圆底筒形陶器^[18],显然不属于东北平底筒形罐系统。从更广阔的区域上看,这类圆底陶器与贝加尔湖沿岸的新石器文化有着相同的造型特点^[19]。还有一条值得特别关注的信息,在最近召开的“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墓学术研讨会”上,邓聪先生指出,这批玉器的原料、工艺和器形较之红山文化玉系统疏远,而与呼伦贝尔的哈克文化甚至更北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土的玉器联系密切。

四

综上所述,南宝力皋吐墓地的文化面貌,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 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以单人仰身直肢为主,也有少量的双人或多人合葬墓。其中,一些墓葬人头骨缺失,而另一些墓葬却发现多葬人头骨的特殊现象。墓地成排,头朝向东南,形式统一。

2. 随葬陶器复杂, 根据共存关系和文化因素分析, 既含有与小河沿文化、偏堡子类型等周边文化相一致的器物, 又有来自北方的某些尚不确定的文化因素。经比对考察还发现一些器形、纹饰具有明显的自身特点, 如口沿饰多重横向仿绳索状附加堆纹筒形罐, 内填平行线的三角、回形、菱形纹鼓腹罐, 复线几何纹双耳壶, 人面形壶和动物造型的异形陶器等。

3. 墓地出土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十分丰富。石器包括打制、磨制石器和细石器, 其中细石器数量最多, 约占出土石器的 80%, 石镞、坠饰、刮削器均通体压削。打制的石锄、砍砸器个体较大。斧、镑、凿、矛、饼形器和石骨朵(杈杖头)多通体磨光。玉器和绿松石制品以装饰类小佩件为主, 有璧、环、璜、坠饰等, 器形多扁平状, 且多钻孔, 工艺精美。骨角制品既有常见的锥、匕、镖、鱼钩、骨梗石刃刀, 还有十分罕见的保存非常完整的骨冠。南宝力皋吐墓地出土的骨器数量多, 选料讲究, 制作细致。

目前虽然不清楚南宝力皋吐这类遗存的情况, 但通过对墓葬的分析, 它既不是小河沿文化的变体, 也不是偏堡子类型向西流布的文化变异, 而是多种文化成份融为一体的多元组合。这种多元组合是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的显著特征, 这一特征本身极具特殊性, 就墓地反映的整体文化面貌而言, 与已知的考古学文化相区别, 似可确认为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

作为新识别的一种考古学文化, 对以南宝力皋吐墓地为代表的这类遗存的鉴别和研究刚刚起步, 一些问题尚待研究。所以, 在搞清楚其基本文化内涵之前, 不宜过早讨论其文化命名问题, 但为了研究方便, 可暂时定名为“南宝力皋吐类型”。

对南宝力皋吐墓地和同类遗存的研究, 还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 从葬俗和随葬品来看, 南宝力皋

吐墓地的时代风格比较统一, 大体属同一时期遗存, 但已测定的碳十四数据年限跨度较大, 有可能通过类型学和间接层位依据, 对这类遗存进行分期研究。

第二, 南宝力皋吐墓地分三个墓区, 应就墓地的分区与布局、墓葬排列方式及随葬品的组合关系, 分析多种文化成份在各墓区所占分量, 考察它们在墓地布局中是否有特殊意义, 对该考古学文化多元结构进行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三, 近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在通辽地区开展了多项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经查南宝力皋吐这类遗存在科尔沁沙地北部的扎鲁特旗、科左中旗和开鲁县都有发现, 比较集中地分布于新开河流域^[20]。从地缘文化关系来看, 科尔沁沙地是连接辽西、下辽河和嫩江下游几大考古学文化区的交汇地带, 在内蒙古东部和相邻东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 科尔沁沙地发现的多种史前文化遗存, 包括南宝力皋吐遗存在内, 或显示出文化交汇地带复杂多样的特征, 或具有自身文化特点, 但均难以纳入到周邻已确认的考古学文化中去。那么这一地区是否只是各区域间文化传播的边缘地带, 还是按文化面貌的地域特征及关联性, 划分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这也是探讨南宝力皋吐这类遗存与周邻文化关系需要考虑的问题。

注 释

- [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尔沁博物馆、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2008年第7期。
- [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附录一,《大南沟墓地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科学出版社,1998年。
- [3] 赵朝洪:《北方新石器文化中人骨标本的碳十

- 四年代的初步分析》，见《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长海县小珠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5期。
- [5]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
b. 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第二章第三节，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
- [6] 许玉林、杨永芳：《辽宁岫岩北沟西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5期。
- [7] 南宝力皋吐墓地测定的四组碳十四年代数据（括号内为树轮校正值）是：距今3700±35年（公元前2140~2030年），距今3985±40年（公元前2570~2515年），距今3990±35年（公元前2570~2520年），距今3405±35年（公元前1750~1660年）。
- [8] 同[2]。
- [9]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鲁特旗人民政府：《科尔沁文明——南宝力皋吐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 [10] 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新民县偏堡沙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沈阳肇工街和郑家洼子遗址的发掘》，《考古》1989年第10期。
- [12]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新民东高台山第二次发掘》，《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1期。
- [13] a. 同[12]。
b. 朱延平：《辽中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刍议》，《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1期。
- [14] 朱永刚：《辽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含条形附加堆纹陶器遗存研究》，见《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 [15] a.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旅顺博物馆：《辽宁省瓦房店市长兴岛三堂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第2期。
b. 同[4]。
- [16] 朱永刚、王立新：《大沁他拉陶器再认识》，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17]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 [18] 同[9]，第134页釜（CM 35：5）、第135页釜（BM 33：1）。
- [19] 冯恩学：《我国东北与贝加尔湖周围地区新石器时代交流的三个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2期。
- [20] 2007~2009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科尔沁沙地及其周邻地区汉以前考古学文化的综合研究”课题组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赴内蒙古科右中旗、扎鲁特旗、通辽市、开鲁县、科左中旗、科左后旗、库伦旗、奈曼旗进行学术考察，并有针对性地调查、复查了一批遗址。

（责任编辑 新华）

本期要览

山东即墨市北阡遗址 2007 年发掘简报 北阡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主要属于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有房址和二次墓葬。遗址中集中出现的极具时代特色的特殊埋葬方式,对研究胶东半岛地区当时的聚落结构、人群组合方式、社会发展阶段及性质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遗址中周代遗存以墓葬、灰坑和围沟为主,还出土大量贝壳遗存和陶片等。

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 C 地点发掘简报 C 地点共清理墓葬 37 座,为圆角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多数墓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主要是陶器,器物组合以筒形罐和壶为主,还出土石器、骨器、玉器等。C 地点墓葬的文化内涵与此前发掘的 A、B 两地点新石器时代墓葬应属同一种文化,可暂称为“南宝力皋吐类型”。

重庆市奉节县桂井战国秦汉墓地 奉节县桂井墓地共清理土坑墓 6 座、砖室墓 1 座。有 5 座土坑墓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出土巴式柳叶形剑和楚式陶鼎、陶壶、铜璜等,具有巴、楚文化交融又以楚文化为主的特色。东汉砖室墓出土陶俑、陶盆和陶摇钱树座等。本次发掘为研究重庆地域文化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性质的几点思考 南宝力皋吐墓地既含有与小河沿文化、偏堡子类型等周邻文化相对应的成份,又有来自北方尚不确定的一些文化因素,以及自身特点鲜明的陶器群。这种多元文化构成是南宝力皋吐墓地最显著的特征,其独特的文化面貌与已知的考古学文化不同,而是一种尚未被认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拟定名为“南宝力皋吐类型”。

西汉帝陵选址研究 西汉帝陵的位置排列有必然和偶然因素。必然是因为西汉帝陵选址继承于传统墓地选择习俗,受制于风水思想的影响和政权稳固的需要;偶然是指皇帝本人的情感因素所起的作用。西汉帝陵的分布是把历史传统、思想意识、地理形势、政治需要和帝王个人好恶结合的典范。